

• 重大主题专栏 •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

编者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党中央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重大而光荣的战略任务，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2024年10月12日至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城乡发展一体化智库主办的“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20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众多农村发展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学学科体系与自主知识体系展开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为引导学术界加强和深化相关研究，本刊特邀部分与会权威专家基于在此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撰写文章形成一组笔谈，以飨读者。

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考量

高培勇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再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面对这样一项必须扛在肩上、落在实处的重大历史任务，该从何处着手？从什么地方抓起？历经持续8年之久的不懈探索，可以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将学科建设落实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上、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来支撑和支持学科建设是一条必由之路。

具体到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和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构建，可以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构建就是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集中体现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构建，两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由此出发，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当首先加以明确。

一、应当是什么样子

中国农村发展学或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显然，需要为之画幅像，作

为致力的方向或目标。

（一）以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

中国农村发展学是一门关于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的科学。或者说，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发展学研究的是农村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那么，中国农村发展学所要实现的，就是研究对象的再聚焦——从人类社会农村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出发，紧紧围绕中国自身国情，在实现一般与特殊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揭示和提炼中国农村发展运行的规律。

其一，中国农村发展学是一门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农村发展学，尽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历史演变、制度设计、政策安排、管理格局、实践总结等构成其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但终究是研究农村发展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科学性之所在。

其二，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的揭示和提炼，是建立在清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农村发展运行一般规律基础之上的。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涵盖人类社会农村发展共性和中国农村发展特性两个层面，并非限于中国农村发展特性一个层面。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立足点之所在。

其三，讲好中国农村发展的故事，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①的道理，中国农村发展学既有各国农村发展学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农村发展学的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二）以自主为导向

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核心和灵魂，在于自主而非本土化。围绕农村发展，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历了引进、移植、模仿、学习西方和苏联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过程。如果说以往围绕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探索主要基于本土化的目的而展开，那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背景下，由“本土化”跃升至“自主”层面——以自主为导向，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的全新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②。贵在自主、重在自主，关键之点在于自主，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核心和灵魂。

（三）以教材或专著为成果形式

有别于课题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学或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成果形式主要是教材或专著。

课题研究惯常的成果形式是研究报告。作为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成果，虽然可以是研究报告，但研究报告只能作为阶段性成果或中间成果，最终则要能够凝练和集中体现知识体系建设成果。也就是说，它的成果形式应当也必须是知识体系。目前来看，最能集中体现知识体系

^①资料来源：《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01版。

^②资料来源：《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01版。

建设成果的形式是教材。既可以是本科教材，也可以是研究生教材，还可以是供党政干部阅读的知识读本。

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中国农村发展学这一关系链，集中反映了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中国自主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二、不能是什么样子

中国农村发展学或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不能是什么样子？也有必要使用排除法，将其排除在工作视野之外。

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而非其他别的什么规律，旨在构建的是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而非其他别的什么知识体系。认识到这一点，就要避免似是而非，力争少走一些弯路。

（一）非以往的农村发展学理论体系或农村发展学教材的简单修订版

一个极易出现的情况就是，在以往农村发展学教材或知识读本的基础上做简单修订。这样取得的成果，显然不是或不可能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重构。这就如同建筑物做装修，在框架结构不做大调整的条件下，所能改变的只能是外表和用途。倘若中国农村发展学或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停留于如此层面，就谈不上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也谈不上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于是，也就走不出用原有理论解释中国农村问题的传统思维逻辑。

（二）非西方农村发展学和社会主义农村发展学的拼接版

在学科教育方面，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搞所谓“平行教学”——将一门课程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分别讲授。例如政治经济学，先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接着讲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时代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显然不能延续或复制这样的模式。比如，上篇是西方农村发展学，下篇是社会主义农村发展学，两篇各讲各的，互不关联。这种拼接版，肯定不符合要求，起码不符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求。于是，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摆脱普遍理论与本土知识的二元关系。

（三）非中国现行农村发展制度及其运行实践的注解版

很容易发生的第三种倾向是，把涉及中国农村发展的若干制度体系及其运行实践加以裁剪、梳理，以此为基础，逐一做专门的注解、阐释。通过这种“制度实践+注解阐释”方法所形成的，显然不是中国农村发展学或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如果这样做的话，也就难以突破“原有课程+中国案例或数据”的局限。

以上三种倾向，在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都是可能会出现。为避免出现以上倾向，学术界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先打好“防疫针”。对于该做哪些事、该如何去做，需要认真开展研究。

三、坚持“四个必须”

从抓关键点和要害处的角度而言，在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要特别注意做到“四个必须”。也可以说，这是绕不开、躲不过、必须进入工作视野的四项工作。

（一）必须涉及框架和构件的调整

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构建，两者虽表述不同，但实质上是一回事：从学科名称来讲，是中国农村发展学；从学科实质内容来讲，是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不过，无论什么表述，特别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农村发展学”之前添加了“中国”二字，从而形成了一个富有特殊意义的专门称谓——中国农村发展学。

这一变化非同小可。既然如此，就不能不涉及框架和构件的调整。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够的构件。所以，必须从框架的重新设计和构件的重新确立入手。换言之，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涉及框架和构件的调整。

（二）必须牵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调整

举凡学科建设，总要落实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上。如果这三个方面没有变化，还是以往的老样子，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就会陷于空谈。

牵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调整等方面的工作，得有人去做，现在就要去做。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将三个体系不加区分、混为一谈。所以，应安排专人聚焦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分层次的研究。否则，新的学科和自主知识体系就构建不起来。

（三）必须提炼标识性概念、标识性范畴和标识性表述

理论体系通常是由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三部分构成的。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得从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入手。围绕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要在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像撰写辞条那样精确地界定并阐释各个概念、范畴和表述的内涵和外延。

（四）必须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

不同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以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基础的，并贯穿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换言之，要以全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支持和支撑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新的理论体系就是以标识性概念、创新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这就必须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也可以说，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是构建全新的理论体系，进而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前提条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

魏后凯

一、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进展

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具有较早的历史渊源，但核心领域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两方面。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来看，在笔者最近主编的《农村经济学》教材中，中国农村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魏后凯、谭秋成，2024）：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为起步阶段。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精英开始关注乡村建设实践，开展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并在全国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一时期，通过实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成为主流，并形成了两种主要的不同研究路径，即海外学者所言的“技术学派”和“分配学派”。第二，1949—1977年是依附和停滞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科研教育体制主要是移植苏联模式，农村经济研究则处于依附地位，主要依附于农业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第三，1978—2002年是形成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学的快速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机构逐渐增多，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各类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而且，农村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在形成和兴起，除了相关教材的出版，一些大学还开设了农村经济学课程。第四，2003年以后为完善阶段。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学术界开展了多视角、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研究，各大学相继设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中国农村经济学、农村发展学迎来了新的春天。

从学科设置来看，农村发展学的发展有两大时机。一是1998—1999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管理学大类下设立农业经济管理类一级学科，其下包含了“农村区域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则设立了农业推广硕士学位，后来改为农业硕士，其下设立了“农村与区域发展”研究方向。现在看来，无论是“农村区域发展”还是“农村与区域发展”，这些名称都不太规范，因为农村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区域。在此之后，不少学校增设了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开设了相关的课程，进行了招生。二是202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把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增加到6个，包括农业经济与管理、林业经济与管理、食物经济与管理、自然资源管理、农村发展和农商管理。其中，农村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二级学科，和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是平级的。这就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及这个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应该看到，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相关教材建设相对滞后。通过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已有的教材主要是关于“农村发展经济学”的，有的教材名称为《简明农村发展

经济学》或《中国农村发展经济学》，还有一些是关于农村发展社会学和农村发展传播学的著作。农村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虽然已有大学开设了这方面课程，一些学者出版了《农村发展概论》相关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晓山还主编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概论》，也有学者编写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概论》等教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以《农村发展学》命名的教材，农村发展学教材建设、学科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早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把农业经济研究所更名为“农村发展研究所”，而且在当年1月创办了《中国农村经济》，到2025年1月将迎来创刊40周年。202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农业农村部的支持下，民政部批准将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到目前为止，这个学会的发展势头相当好。并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两轮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中，2017年第一轮时就将其列为优势学科，2023年第二轮时又将农村发展学列为优势学科，将农村经济学列为重点学科。在新一轮学科建设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将充分发挥学会、刊物等平台优势，抓好《中国农村发展学年鉴》以及《中国农村发展报告》《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等系列报告。在此基础上，着力加强教材建设和前沿研究，重点是组织编写《农村发展学》教材和《农村发展学前沿》等。当然，推进农村发展学教材建设和前沿研究，还需要得到国内学界和各位同仁的支持。尤其是农村发展学前沿研究，涉及领域较多，需要依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集聚全国的资源来有力推动这项工作。

二、如何理解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

农村发展学（Science of Rural Development）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是与城市发展学相对应的。笔者以为，农村发展学是从综合视角来研究农村的整体以及各个领域的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和规律的科学。可以说，农村发展学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地理学等多学科融合发展形成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它是发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农村发展学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学，它是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既要研究世界农村发展的共性和一般规律，探究世界农村发展的普遍趋势和基本特征，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探讨中国农村发展的演变趋势、形成机理、道路选择、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尤其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农村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村发展学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重点强调两点。第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国内对食物、粮食的需求量和消费量就相当巨大，而且种类多样，这就需要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色列、荷兰尽管是农业强国，但由于人口规模小，粮食需求量不大，自给率较低。而中国不能这样，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障粮食安全。同时，在中国，农村空间占陆地国土空间的绝大部分，按城（镇）区建成区面积计算的城镇空间目前仅占1.3%左右，

95%以上陆地国土空间都是广大的乡村^①。中国农村人口众多。2023年全国乡村常住人口有4.77亿人^②，农村户籍人口有7.3亿人^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9亿多人。所以，有些人所说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农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好像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就不重要了”的观点肯定是不对的。不管城镇化怎么推进，未来中国还有那么多农村人口，国土空间绝大部分也还都是农村。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农村发展学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巨大。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农村是最突出的短板，也是最重要的薄弱环节。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十分庞大。相对而言，西方农村发展学现在处于稳定时期，甚至在有的国家处于停滞的阶段；而中国农村发展学迎来了新的春天，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所以，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发展空间更大、发展潜力更大，未来的发展前景也更加广阔。

当然，由于国情、农情不同，发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西方农村发展理论并不是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拥有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农业生产经营仍以小规模家庭分散经营为主体形态，在制度背景、发展阶段、历史文化、基本农情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这种制度背景和“大国小农”的国情特征决定了西方农村发展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必须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学。

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学，核心是构建其自主知识体系。一般地讲，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三大基本特征，就是自主性、知识性、体系性。要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需要具有这三大基本特征。第一，自主性。就是要强调本土化、中国化，突出中国的主体性地位，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原创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第二，知识性。就是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经过验证是正确的，且被人们相信和接受。如果一种新思想、新观点提出来以后，国际上都不承认，得不到广泛的相信和认可，那么就难以达到知识性的要求。第三，体系性。它不是碎片化的，也不只是某一个方面的知识点，而是农村发展各领域、各方面知识点的系统集成或集合。

关于如何科学把握自主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下文简称“三大体系”）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自主知识体系是三大体系的基础，三大体系是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有学者说知识体系就是三大体系，笔者对此并不认同。事实上，知识体系和三大体系是一种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重要构成。但是，在三大体系之外，知识体系还有一部分，二者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

^①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2》中的数据计算。

^②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③根据2023年底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计算得到城镇户籍人口，进而得出农村户籍人口。原始数据来源为《公安部：2023年底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8.3%》，<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405/27/WS66541261a3109f7860ddf8b5.html>。

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内容体系或知识体系是多维的，可以从不同视角展开探索。比如，从要素的角度来看，要研究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村土地利用等都是农村发展学的重要内容。西方农村发展学在早期就十分重视农村土地利用问题。从发展的过程来看，要研究农村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农村的建设、治理和政策，体现的是发展的全过程。从领域来看，需要研究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它是一个全领域、全方位的“五位一体”格局。当然，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可能还有更多维度。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不仅需要研究古代、近代、现代中国的农村发展，还要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思想史。从空间的维度来看，可以从不同类型的区域来研究农村发展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形成机理。比如，针对四大区域、省域、县域、村域、主体功能区等，分别研究其农村发展。总之，中国农村发展学应该是一个多维的内容体系和知识体系。

三、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

在新形势下，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力来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很明显，分析农村发展问题，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站在少数的利益集团立场，其结论自然是不一样的。二是强化批判性借鉴。要借鉴和吸收西方农村发展学中合理的成分，对于西方的一些概念、研究范式和理论学说，要进行批判性借鉴，要走出照搬模仿，摆脱学徒思维，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三是要用中国的理论回答中国的问题，解释中国的现象，提炼中国的经验。中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既催生了诸多新问题、新现象、新模式，也有利于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要立足中国问题、中国现象、中国实践，加强理论提炼和原创创新，形成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化，形成一个知识化的体系。四是推进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当前，尽管不少大学招收了农村发展方向的研究生，但开设农村发展学或农村发展概论课程的不多，课程体系不健全，教材也严重滞后，加强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是当务之急。五是要重视历史。要加强中国农村发展思想史、中国农村发展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农村发展思想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发展史的研究，通过思想史和发展史的深入研究，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能凭空产生，一定要和历史、文化传承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所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才会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魏后凯、谭秋成，2024：《农村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26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之我见

何秀荣

国内最近非常热烈地在讨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少机构在探讨甚至着手构建相关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2024年10月11日至13日于北京举办了“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研讨会”；又如，中国人民大学朱信凯教授在《农民日报》2024年8月10日第5版发表了《三农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一文；等等。但如何理解和如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当下是见仁见智，纷纭不一。这种纷争和讨论，无疑有助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观念和认识误差所导致的实际行动偏轨。

为什么提出的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而不是“构建中国自然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或“构建中国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本原因在于，自然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现象和物质世界，其知识不因国别、种族、文化、意识形态等差异而不同，甚至在时间维度上也不会因为昨天或今天而发生变化。只要物质条件不变，其结论就不变，并且作为正确的知识得到广泛公认。即使遭到强权禁止，自然学科的正确知识也至多只能被一时封杀。例如，罗马教廷禁止哥白尼的“日心说”，并暴力逼迫伽利略放弃这一理论，但那是反科学的行为。1882年，罗马教皇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日心说”；1979年，梵蒂冈教皇保罗二世代表罗马教廷为伽利略公开平反昭雪。

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其知识会因国别制度、种族文化、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等差异而有极大差异，因此，适合解释一国一地的人文社会现象及因果关系的知识和理论，未必一定适合于其他国家。甚至对同一国同一地的人文和社会现象及其因果关系的知识结论也会因为历史时段差异而不同，因为人文知识的来源样本有明显的局限性和差异性，东西方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昨日中国和今日中国之间的人文社会历史条件差异很大。使用出自不同基础来源样本的知识结论时必须小心，否则，可能因为病象相似而误判为病理相同（实际病理不同），从而导致错诊误断，甚至根据错误结论开出错误处方，危及他人生命。例如，在农民研究上，不少师生和研究者经常拿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提出的“小农理论”来研究今日中国的商品小农，由此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政策措施自然与当下的实践是不匹配的。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面，人们需要注意其共性，但更要注意其特性。

随着世界范围内研究越来越深入、交流越来越广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视野不断扩大，样本局限性会不断缩小，时空差异也会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各国的特性能够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学科体系提供补充，并使其更加丰富和多样化。这既需要各国基于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进行深入的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也需要各国基于他国的历史和国情进行深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而印证和丰富已有的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必须谨防错误认识。例如认为中国要建立独立于其他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或学科体系，又如认为中国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或学科体系。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世界历史上全人类贡献的知识的结晶，绝不是，也不可能是由一国独立建立的，否则，一叶障目会造成本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学科建设面临巨大障碍，甚至出现偏离。各国只是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历史形成过程各阶段中的贡献不同。例如，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孔孟老庄等思想对公元前的世界哲学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但并不排除其他国家的哲学贡献。在一国贡献较多的那个阶段，该国往往会形成有影响的重要学派，这些学派的观点甚至会成为国际学界的主流声音。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做出当代中国对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贡献。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要有中国声音，并且要有被世界认可的中国声音。要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造的重要贡献者！而不仅仅成为他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解读者，不能成为彻头彻尾的皈依者，更不能成为明知其错而自己无力反驳的无奈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曾有过不堪回首的记忆，像敦煌学、中国法制史等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知识结论居然是由海外研究者得出并主导，甚至连这方面的专题国际会议都没有中国研究者参加。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称号的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教授就是为了在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发出中国声音，主编了10卷、约510万字的《中国法制通史》^①，纠正了国外很多对中国法制史的误识错判，并使《中国法制通史》成为海外研究和学习中国法制史问题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历史和国情，对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注意联系国际共性知识来研究，更要注意从中发现中国的特性，基于中国案例得出特性条件下的新知识。只有如此，才可能有独立的知识发现，才可能被世界认可，从而对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作出贡献。在中国现象、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责无旁贷地发出中国声音，而且应进入被世界普遍认可的权威行列，而不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

当今，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中国不少学科对中国现象和问题的研究确实普遍缺乏被世界认可的声音，更遑论对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学科知识体系的真正贡献。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中，经常可以见到师生和研究者动辄从西方理论、西方模式出发，而忽视了其对中国国情和中国条件的适用性，甚至不是从中国问题出发，而是用西方理论和模式去套解中国实践，从而得出很多不符合事实甚至贻笑大方的研究结论。

^①全书对中国法制史进行了全方位总结，凝结了20余位法律史学专家近20年钻研的成果。详见张晋藩，1999：《中国法制通史（全10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事实上，中国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是应该而且能够对世界知识体系做出中国贡献的。例如，在“三农”问题上，中国用改革开放后4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农业农村发展之路程，世界上鲜有能在“三农”问题的剧烈度、广泛度、复杂度上和中国比肩的国家；在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史上，从未有过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众多农村人口、如此广阔的空间跨度、如此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如此巨大类型差异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发达国家当年的现代化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环境带来的影响，更没有计划经济的历史遗产，这些正是中国为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丰富案例、做出理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农村发展学、农村政治学等学科大有为世界知识体系作出中国贡献的空间。

中国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获得世界公认，必须首先遵循学科体系的基本规律和拥有学科的基本要素，否则，学科就是不成熟的，甚至只是自认的所谓学科知识体系。学科要素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五点：第一，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框架体系在内，并且光有一两个理论是不够的，必须是理论群；第二，凡是成熟的学科，都有分支或者分支学科群，如果没有分支，这个学科还是在发展初期，甚至不能被称为学科；第三，会使用很多概念，每一个概念都应是清晰的，不仅内涵非常清楚，并且外延可以明确界定；第四，要有科学方法；第五，一定要有适用条件，要明晰适用范围。

从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实践看，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距离建成的差距还很大。这些问题包括：大量使用内涵和外延不清的概念、“假大空”概念、“云雾山中的新名词”；拾人牙慧和“新瓶装旧酒”的现象较为普遍，人云亦云，毫无独立见解；把对西方理论的解读当作研究，对政策文件的解读欠缺学术性；缺理无据、逻辑混乱的自我成言；功利主义导向的研究较多存在；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原本作为利器的计量工具已经异化成机械的计量模型主义，不做理论分析和因果分析，仅用数据一算就是结论。种种非科学研究的现象不一而足，如何产生创新和贡献？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尤其需要一个学术导向正确的学术价值评判体系和容纳自由探索的学术研究环境。只有净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生态，才能构建真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而不是构建出一个畸形的、自认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目前看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贡献者，而绝非满足夜郎自大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需求，更不能空喊口号。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学科发展规律，净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生态；必须独立思考、理智思考，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跟风；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并立足于中国国情，以世界看中国、以中国看世界，从中国问题研究中补充共性知识、挖掘特性知识，丰富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关于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青 平

一、中国农村发展中的诸多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形成了许多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经验。例如，在探讨土地问题时，西方体系普遍秉持土地完全私有产权的原则。中国稳步推进和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当前，诸如土地托管等新型土地管理模式应运而生。这些创新举措均源自中国的实践探索，体现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独特贡献与创造力。

又如，对于农业现代化，西方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欧美国家的大规模经营的道路，即通过超大规模经营，转移农业劳动力，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另一条是东亚国家通过农业多种经营，以工补农、以商补农，使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刘滨、唐任伍，2024）。中国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围绕如何在保持家庭经营灵活性的同时实现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化这一核心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提出了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有机衔接的路径：一是依靠土地流转推进土地适度规模化，二是通过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服务规模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之处之一就是服务规模化。

再如，在贫困治理方面，西方主张通过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来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贫困率下降。中国认为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亦是政治问题。在实践中，中国开展了很多成功的探索，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形成了精准扶贫、合力扶贫、产业扶贫、内源扶贫、绿色减贫等理论，中国脱贫经验走向世界。

此外，在城市化方面，中国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体现并保留乡村的和谐与内在美，体现了中国独有的理论创新。

二、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农村发展的诸多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经验，有待学界作出总结和提炼，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不过，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还存在较多与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不相适应之处。主要包括：第一，理论功底不相适应。在一些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课情况不理想；学生的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基础薄弱，方法训练严重不足；学生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史学）的学习薄弱，也缺乏基本的农学知识和新农科知识。第二，实践经验不相适应。由于较少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教师和学生不懂农业、农村、农民，研究局限于理论推导与模型构建，即开展的是所谓“黑

板经济学”与“电脑经济学”研究。第三，人才队伍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研究能力与创新动力不足，对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了解有限，学术活动参与程度低，对“三农”问题领悟的深刻性亦显不足。第四，培养体系不相适应。当前，学生训练水平整体不高，课程体系较陈旧，培养过程监管不严。学科新思想、新观点、前沿动态很少进入课堂。培养管理过程质量控制不严，实践环节薄弱。第五，评价体系不相适应。科研成果重数量、轻质量，一些论文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无用。选题无病呻吟、远离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坚持问题导向）。第六，学者的情怀和格局不相适应。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深层次关注及深层次热爱少了，功利目的逐渐取代了“为学问而学问”的初心。第七，研究范式不相适应。当前部分研究既缺乏严谨的思辨，也未建立起完整的猜想与反驳体系。

三、新时期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优势

在新时期，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具备显著的优势。具体而言：第一，理论资源有优势。相较于单一理论框架，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传统文化精髓为基础，同时充分吸收国际社会科学新发展成果，更易于实现理论创新。同时，中国已经有了丰厚的相关理论资源。老一代领导人提出了诸多具有前瞻性的农业观点，如毛泽东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陈云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三农”工作以及推动乡村振兴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两山论”、“两藏论”、大食物观以及粮食安全中的能力论等新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些为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第二，文化资源有优势。中国文化底蕴深厚，古代有丰富的农耕文明思想，如耕战策略、粮食政策、荒政管理、河流治理等，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第三，学术传统有优势。老一代学者务实求真的学术传统在“三农”研究领域得到了良好的传承，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费孝通先生等老一代学者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乡土中国、礼治秩序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为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第四，学科特性有优势。农村发展学科天然具备与实际紧密结合、深入农村的特点，众多学者及学生来自农村，对农村研究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和理解力，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学者已经意识到推动新时期理论创新的必要性，愿意为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四、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问题

（一）研究主题

发展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的根本性主题。农村发展有一整套需要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发展手段、发展的投入体系等。中国在农村发展战略上有独特的创新，比如提出了融合发展、内生发展、特色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和梯度战略。这些战略共同构成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理论资源，并为相关实践提供了指导。

（二）核心要素

学科要划分范畴、探寻规律。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其核心要素涉及学科的对象与边界、学科

知识的逻辑体系、学科的关键要素、学科建设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其中：农村发展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有按层次展开的纵向体系（如农民—农户—村组织—社区—社会逐层解析），也有按领域划分的横向体系（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治理多维度展开）。农村发展学科的关键要素包括教师队伍、教材、课程和平台。农村发展学科建设需遵循内部与外部规律。内部规律就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外部规律是这个学科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还有人才培养的规律，如立德树人、交叉学科建设、教育数字化、AI和数字素质培养、劳动教育、知识能力价值观一体培养、产教教融合，这都是目前农村发展学科建设要特别重视与关注的。

（三）在内涵把握上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

第一，处理好学科体系、专业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的关系。农村发展专业主要是就业的概念，农村发展学科主要是学术的概念，二者有差别，最后要落实到农村发展学教材体系和课程体系上，这样才能有农村发展的话语体系。第二，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推动农村全面协调发展，是中国农村发展的突出特征，也是被实践证明的唯一的成功方式。第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其他方面发展的关系。农村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实践证明，经济子系统若不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协同发展，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持续。第四，处理好城乡关系。实践证明，解决农村问题的很多出路在农村之外，城市化助推农村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突出表现为城市化推动了农民就业与收入增长、带动了农村社会与文化发展。第五，处理好政府、社会与农民的关系。农民在健康、文化、技能、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全面发展，才是农村的真正发展，其本质是农民群体的现代化问题。第六，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文化发展的关系。文化的空洞化导致农村基层许多不良现象，文化建设、文化设施、文化氛围薄弱导致农村难以留住高素质农民，制约了许多地区农村的发展。第七，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发展中，既要发挥政府计划的引导作用，也要利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功能。第八，处理好人口数量和结构变迁与其他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减少、出生率下降、农村人口向城镇和城市逐步集中是大趋势，青年一代农民正在从利益、技能、情感上远离农村与农业。这些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深远。第九，处理好国际与国内的关系。实践证明，大学里多数发展得好的学科和专业，国际合作同时也发展得好。在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一定要使这一学科和相关的学者、科研、课程等与世界最高水平农村发展学科“近身竞争”，提升中国农村发展学科的整体实力。第十，处理好学科建设与未来农业、农村的关系。农村发展学科要面向未来。未来的农业、农村是逐步实现乡村振兴的农业、农村，是“三产融合、智慧智能、绿色低碳、供给丰富、健康引领、面向全球”的农业，是“经济繁荣、生态宜居、治理现代、平安和谐、生活富裕”的农村。瞄准这个未来大方向、大趋势发展农村发展学，这一学科才能有朝气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刘滨、唐任伍，2024：《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时代价值与推进路径》，《新视野》第1期，第69-75页。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

应突出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

姜长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②。中国农村发展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其自主知识体系，要统筹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更好地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

一、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和学科形成的核心价值所在。中国农村发展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要能立得住、可持续并赢得广泛认可，必须直面中国农村发展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形成较为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逻辑，科学回答“是什么，为什么、依靠什么”的问题。中国农村发展学应主要研究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发展问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及相互作用。中国农村发展学要注意基于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大量调研和现实考察（例如，各有侧重的宏观观察、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或全景式观察、解剖麻雀式分析、显微镜式研究的有机结合），发现有较强透视力、前瞻性和创造性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分析逻辑，揭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本质、演变逻辑、运行规律和未来走向，推动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丰富多彩的中国农村发展实践是构建中国农村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珍惜的底蕴和沃土。立足国情农情和发展阶段特征，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问题，回应中国农村发展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需求，助力实现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中国农村发展学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推进中国农村发展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归根结底要为解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服务。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2.htm。

^②资料来源：《中办印发〈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人民日报》，2022年4月28日01版。

中国农村发展学也要注意基于对中国农村发展历史和阶段转变的回顾、对不同阶段发展状况和发展需求的比较、对城乡关系演变分析，客观评价中国农村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揭示中国农村发展的规律与演变逻辑，以推动中国农村高质量发展，促进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回溯过去有利于更好地面向未来、引领时代。因此，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必须将中国农村发展史甚至相关学术史研究放在重要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的来龙去脉和演变逻辑，更好地把握当前中国农村发展所处的历史坐标和未来走向，也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农村发展学科传承的脉络。何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发展方式转型和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交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乡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城乡经济体制转型呈现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应注意用转型发展视角、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眼光观察中国农村发展，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彰显其传承性和民族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①但客观地说，当前，在中国农村发展学及相关学科中，用模型导向代替问题导向、用数量分析代替经济社会关系分析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举例来说，研究农村产业发展，有的不去考察其鲜活的发展实践、演变逻辑和发展趋势，有的不去调研其现实困难、问题和利益相关者行为，而是将其简单化为一个量化指标，用官方统计数据、其他团队的调研数据去“跑回归”，就得出所谓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类似研究在近年许多课题申报书甚至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并不鲜见，甚至有人“好心”建议他人这样做“出成果最快”，不必傻乎乎地去做调研。有些研究者在高水平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章，但在讨论中国农村发展政策时基本“无话可说”。这些情况很难不让人相信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的改进空间很大。毕竟，中国农村发展学应该是经世致用之学。当然，笔者在此无意否认经济计量学模型和数量分析方法的重要性，无意否认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者应该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分工，不反对利用他人的调研数据甚至二手资料去做研究。而且，笔者始终认为，任何严谨的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尊重的，不同学者可以各有其比较优势。在此，笔者只是强调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首先应该根植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重视影响中国农村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因素及相互间的关系，而不能脱离真问题，甚至将问题伪化，去做那些实际上脱离真问题的伪“研究”。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因此，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更要注意聚焦真问题、关注本原型问题，甚至需要关注哪些不是学科真问题。“贪多嚼不烂”“种了别人地，很可能荒废自己田”，很可能因此丢失学科核心价值。例如，美国、澳大利亚的农村发展问题，不是中国农村发展学需要关注的真问题，但美国、澳大利亚农村发展过程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学可以关注的真问题。又如，单纯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是中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并不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研究任务；而粮食安全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却是中国农村发展学不容回避的课题。

^①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http://www.nopss.gov.cn/n1/2016/0519/c219468-28361739.html>。

二、守正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①这句话对于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富有指导意义。当前的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其未来发展仍必须基于其现有基础和历史遗产，尊重其长期的历史积淀，不宜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导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需要坚持守正创新。

近年来，数字技术深入发展，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研究范式，导致创新甚至部分重塑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性迅速凸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不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因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是一种知识有序组合的整体，而一条陈述能被称得上是知识，必须满足被验证过、正确、被人们相信这三个条件（郁建兴和黄飏，2023）。虽然数字技术对中国农村发展乃至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日益广泛且深刻，但这种影响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并充满不确定性；在当前乃至可以预期的将来，这种影响即便具有局部颠覆性特点，也很难断言其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的颠覆性影响，更不具备知识必须满足的前述三个条件。近年来，有些学者积极探索机器学习方法在农村发展研究中的应用，这种努力值得肯定。但是，如果不注意分析影响中国农村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因素及相互间的关系，只是简单地将相关研究任务交给“机器学习”完成，这种“重机器不重人”的研究的质量如何就很难说了。就总体而言，对机器学习方法的应用应该秉持开放、谨慎态度，将其置于边际创新而非主流创新的地位是合适的。何况，数据质量和可用性、机器学习模型的复杂性和可解释性、潜在的数据资源壁垒和研究的可复制性，类似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应用机器学习方法的局限性。至少从目前来看，机器学习方法还难言成熟。要反对“炫技主义”，警惕盲目迷信机器学习甚至滥用该方法导致损害中国农村发展学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

坚持守正创新，要求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更加重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其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大众化传播。从正常理解看，农村发展学科的范围远大于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但是，在现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农林经济管理是管理学的一级学科，农村发展是其下所包括的6个主要二级学科之一。换句话说，农村发展仅作为二级学科，与农业经济与管理等二级学科平行。这种状况欠合理，只能是权宜之计。无论从内涵、外延看，中国农村发展学应该成为与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平行的学科。加强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需更加重视思想、范式、模式和研究视角创新，始终坚持思想重于技术、方法要为发现和解决问题服务。

中国农村发展学要坚持守正创新，需要从尊重概念规范和学术话语的一致性做起。以粮食安全为例，其他国家没有与中国“粮食”概念内涵一致的术语，国际可比的概念是谷物。在中国，粮食

^①参见《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第4-11页。

按作物品种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所称“food security”准确译法是“食物安全”，其中，食物的范围远大于中国“粮食”的范畴。还有学者在研究粮食安全时，把“粮食”概念拓展到大食物观意义上的“食物”概念。概念是思维的细胞，也是学术对话的基础。基本概念更是学科大厦之根基。概念的不一致，将使学术讨论和学术对话失去共同基础，进而导致“各说各话”问题。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可以参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关于食物安全的理念，秉持大食物观视野，但不宜将粮食安全与食物安全、将“粮食”与大食物观中的“食物”等同。大食物观实际上要求
在粮食之外拓展解决食物安全的路径。

坚持守正创新，还需要注意根据问题导向完善研究方法。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重视农户问卷调查及其数据分析，为此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其敬业精神值得钦佩。但许多问题需要注意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反应，单从农户视角未必能形成全面准确的判断。例如，关于农业绿色转型问题，除农户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甚至地方政府都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农业绿色转型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及整合协调，仅开展农户问卷调查是不够的。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需要基于问题导向，重视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1. 郁建兴、黄飏，2023：《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政治学研究》第3期，第14-24页。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的内涵与中国特色

周应恒

一、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的内涵与现状

农村发展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农村发展学科的形成，缘于人类社会由以农业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社会向以非农业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型，带来农村社会原有形态与秩序的重构。需要认识与把握这种演化进程的规律，并应对各种科学与社会问题，逐步构建新的知识体系。

作为学科客体对象的农村，也称乡村，是相对于城市（镇）的概念。乡村与城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地域综合体，二者在功能定位、人口分布、产业活动、聚落形态、文化特色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

^①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3》第十二部分农业的主要统计指标解释（第404页）。

（魏后凯，2023）。乡村包括了城市之外的其他一切地域，是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主要活动空间。人口集聚规模小、密度低、接近自然是乡村的基本特征（魏后凯，2023）。在中国，因视角与出发点不同，乡村的边界具有较大差异。狭义的乡村指村庄所覆盖的广大地域。按照是否具有行政功能，村庄可以分为自然村和行政村，其中，自然村是指村民经过长期在特定自然环境中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而广义的乡村则是乡镇和村庄所覆盖的地域全域（魏后凯和谭秋成，2024）。

乡村是承担着乡村功能且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地域综合体，具有独立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系统。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农村，居民多为农民。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作为经济产业活动与居民生活的空间，其结构和成分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这正是农村发展的必然结果。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的边界与形态可能发生变化，且出现分化。城镇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分化、被替代乃至消亡的过程。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乡村可以划分为聚集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4类。作为孕育农业文明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乡村呈现多种功能与多元价值：既是食物资源的供给者，也是农村居民生活和精神的家园；既是城市化廉价土地和工业化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者，也是生态环境的保育者；既是国民经济内需市场的供应者，也是新兴产业发展地；既是传统文明的载体和源头，也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刘奇，2014）。在现代社会中，乡村与城市各具独特功能，并不完全对立，而是相互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构成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空间。

作为学科对象的农村发展，是一个多维的复杂概念，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含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还涉及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从乡村社会的使命看，农村发展的核心就是要确保乡村多种功能与多元价值的有效发挥，促进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各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是农村发展的本质。当然，一切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所以，农村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为了探究具有丰富内涵的农村发展的一般规律，国际上先行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已经从多元视角，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文化学乃至地理学等的理论与分析范式开展了系统探索和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学科知识积累。与国际上的研究历程一样，中国也形成了农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等专门的分支学科。比如，突破传统农业经济学的约束，形成了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农村经济学、基于社会学范式的农村社会学、基于人类文化学范式的农村文化研究、基于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范式的乡村治理研究、基于地理学范式的乡村地理研究、基于乡村文化与生态系统分析范式的乡村营造研究等。但是，这些研究的积累，显然还没有构建能包容农村发展全部内容的知识体系；这些研究还相对分散，缺乏体系化，关键是没有在整合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独立的农村发展学理论范式，并构建整体的分析框架和学科体系。构建能反映各国农村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构建系统的学科体系，是农村发展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条件。因为不同国家的种族、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发展路径与发展阶段等差异巨大，既有的知识体系不能全面适用于所有国家，既存的学科体系也不能完全适应于农村发展的需要。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要基于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结合对中国农村发展情境和实践探索特殊性的分析，拓展并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理论成果。

二、中国农村发展实践的独特性及其意义

中国历史悠久、人口规模巨大、民族多元、农业形态复杂多样。同时，“大国小农”的格局，崇尚“天人合一”的独特文化，以及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乡村治理机制，再加上中国独有的制度体制，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独特性。近代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探索，可以追溯到中国在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族国家体系之后，即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各界知识精英自发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开始。针对旧中国农村的衰败危机，在广泛的农村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开展了包括推进平民教育、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建设农民合作组织等多种路径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尽管因为时代的局限，这些乡村建设运动所取得的成效比较有限，但仍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产出了不少调查研究成果。这些连同其经验教训，都具有借鉴意义。

而更深刻的农村变革实践是中国历时 70 多年持续推动的以制度变革为基础的农村发展和改革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对经济社会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农业农村支持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农村建立了以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为核心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农产品分配的格局（魏后凯，2023）。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依靠大量的劳动积累，促进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但是，这种独特的计划经济管理制度严重阻碍了农业与农村的全面发展，是造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的原因。这也形成了之后制度改革的契机。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体制与发展条件的巨大变化。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的最近 20 多年，国家调整发展战略，将“三农”工作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加大公共财政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支援机制，推动全社会支援农业农村发展。不仅突破农村范围，确立以统筹城乡或城乡一体化的机制推动新农村建设，而且推动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创新性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并探索促进城乡融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这些举措使中国农村发展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新时期。在此期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格局和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快速而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是：随着撤县改区或改市、撤乡并镇、合村并居等政策的推进，短时间内，近百万的自然村落快速消亡；中国农村出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格局转型（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这种变化蕴含中国农村发展的独特机制与条件，对农村发展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国农村发展的这些独特探索，无论是理论或实践，还是经验或教训，都构成了农村发展的中国特色。对这些独特探索开展科学、规范、系统的学术研究，将丰富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这是中国特色农村发展学建设的重要基础。

三、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的内容

农村发展学是应用性强的综合性学科。其学科建设和发展，不仅需要规划构建独立的学科体系，

而且要建设能满足研究需要的科研平台与队伍，推动本学科科研创新，还需要建立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并承担服务社会的职能。

首先是学科体系设置。农村发展具有多维属性。得益于国内外学术界的长期探索和农村发展相关研究多视角的开展，如前所述，多个分支学科得以形成，特别是形成了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等比较成熟的分支学科。这构成了农村发展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基础。当然，还有不少分支学科的发展还不够充分。面对复杂的农村发展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化，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还会出现，农村发展学的学科体系也将不断丰富、更加完整。在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中，既需要通过学科规划整合各分支学科，推动学科的融合发展，做到兼容并蓄，形成学科体系，也需要基于分析范式的差异，促进各分支学科各自专业的发展，避免过多拼凑。

其次是科研创新。必须推动对农村发展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学术研究，注重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通过建立本学科的理论范式和分析范式，借鉴多元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开展科学、规范的研究，不断丰富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夯实农村发展学学科发展的基础。推动农村发展领域的科学研究，需要打造具有特色专长的科学研究平台，并依托这些平台组织建立结构合理且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活力的科研队伍。同时，要加强专门的学术团体建设，促进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

最后是人才培养。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要注重为农村发展事业培养人才。因此，应依托相关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农村发展的探索实践，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并推动知识普及和有效传播，包括对教学、教材的完善和人才培养方面其他条件和手段的改善。要注重不同层级人才与培养方案的匹配。此外，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还必须服务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应用学科，农村发展学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开展研究。在中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实践中，不但要借鉴国际经验，更要结合中国情境，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将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研究成果融入学科知识体系。

总之，建设农村发展学具有独特的创新意义。本学科对象是明确的，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科学问题是客观的，社会需求更是急迫的。农村发展学已经形成了多个成熟的分支学科，学科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构建独立的科学研究范式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期待并相信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建设不仅会促进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还将对中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其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刘奇，2014：《“乡愁”九脉》，《中国发展观察》第2期，第41-44页。
- 2.刘守英、王一鹤，2018：《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第10期，第128-146页。
- 3.魏后凯，2023：《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第2-20页。
- 4.魏后凯、谭秋成，2024：《农村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26页。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陈秋红）